



鲁迅研究书系

# 鲁迅的 创作与 尼采的箴言

闵抗生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 鲁迅研究书系 ·

**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

闵杭生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9.5 印张 5 插页 238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419—5082—3/G · 4372

(精装) 定价 32.30 元

# 鲁迅研究书系编委会

策 划/陈绪万

顾 问/王士菁 林 非

主 编/袁良骏

副主编/王富仁 阎庆生 郑欣淼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戈宝权 方 似

刘建军 李允经 肖夫田

余渊达 张 华 迟 姗

陈漱渝 林 非 郑欣淼

袁良骏 高 信 阎愈新

阎庆生 魏 明

# • 鲁迅研究书系 •

## 序 言

袁良骏

自 1913 年恽铁樵(焦木)对《怀旧》的评点以来,鲁迅研究整整走过了 80 年的路程。80 年来,学者辈出,论著汗牛充栋,鲁迅研究已成为与“红学”比肩的“显学”之一,成就斐然。

然而,不必讳言,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鲁迅研究,曾受到过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实用主义一度过滥,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引入歧途。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大鲁迅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认真清算“四人帮”对鲁迅的神化、篡改和歪曲,鲁迅研究理所当然地和其他学术部门一样,恰如枯木逢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开拓、创新与突破。与此同时,宝岛台湾也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禁

令，诸多学人建言立说，踊跃努力，正在为“鲁迅学”开拓新生面。90年代和世纪之交，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的鲁迅研究，必将呈现更加生动活泼的面貌。

“鲁迅研究书系”承前启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编辑出版，它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总结，也是90年代和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开路先锋，它将在鲁迅研究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鲁迅研究书系”共收入专著、专书15部。除关于鲁迅小说、杂文的二三专著外，偏重于论述鲁迅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思想，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概括性。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5部专著中有11部出于中青年学者之手。它充分展示出：中青年学者已成为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我们深信90年代和世纪之交将是中青年学者纵横驰骋的年代，这正是鲁迅研究的希望所在。

鲁迅是中华民族不朽的伟人，也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巨匠之一。像莎士比亚一样，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就此而言，这套“鲁迅研究书系”不过是滔滔无尽话题中的涓滴而已。但愿它能成为人们珍爱的晶莹的涓滴！

1992年9月26日初稿

1995年5月16日改定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鲁迅

# 目 录

序 .....	贾植芳 (1)
代自序：我的《野草》研究	
——回顾与自评.....	(5)

## 第一辑

尼采简论 .....	(21)
鲁迅与尼采 .....	(40)
《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	(72)
荒谬与疯狂 ——《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之二 .....	(88)

## 第二辑

《过客》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	(101)
尼采与《野草·题辞》 .....	(120)
《秋夜》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	(128)
《影的告别》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	(141)
《求乞者》与尼采对道德的重估 .....	(156)
尼采的“超人”基督与鲁迅的“人之子” .....	(169)
《希望》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	(178)
《雪》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	(187)

Zarathustra 与“火的冰”及“死火”	(193)
《墓碣文》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199)
《死后》与《Also Sprach Zarathustra》	(210)
“这样的战士”与尼采	(217)

### 第三辑

《秋夜》中的“我”怎样看待“枣树”的“梦”?	(225)
尼采笔下的芸芸众生与《秋夜》中的天之僇民	(227)
“影”为什么拒绝给昏睡者以“赠品”?	(230)
“影”的“二重”性与尼采	(234)
贪恋“旧榜”的“昏睡者”	(238)
裸体者与假扮“神圣”者	(240)
鲁迅的《复仇》与尼采的“报复”	(246)
“过客”和“流浪人”	(249)

### 第四辑

《求乞者》·《乞丐》·《施舍》	
——《野草》与屠格涅夫《散文诗》比较之一	(259)
《好的故事》·《蔚蓝的国》	
——《野草》与屠格涅夫《散文诗》比较之二	(266)
《希望》·《老人》	
——《野草》与屠格涅夫《散文诗》比较之三	(273)

### 附录

鲁迅论尼采	(281)
后记	(292)

# 序

贾植芳

在我国的鲁迅研究中，关于尼采与鲁迅影响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早在 30 年代以来就已开其端倪了，但真正地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则不能不说这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从 70 年代末以后，即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正常化，西方科学与文化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冲击波，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新变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觉醒中，第二次发现了尼采，引进了尼采的结果，也正如在清末开放性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大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的历史觉醒以后，发现了尼采，引进了尼采一样；又正如经过这第二次大战的炮火灾难，西方世界又重新泛起尼采热一样。这种相似性的历史文化现象，很值得人们深思和研究。

但我国这些年的关于鲁迅与尼采影响关系的研究，一般还停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总的说来，其基本论点不外：(1) 尼采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自身否定力量，他的摧毁一切历史旧传统的偶像破坏论者的战斗精神；(2) 他的重新估量一切价值的激进思想；(3) 他对超人的出现的呼唤和向往，以及对个人主观意志力量的赞扬。而这种对尼采思想在鲁迅以至“五四”前后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影响关系的总结性的论点，也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背负了历史苦难的十字架的前后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独立性和在挣扎中探索新路，倔强地前进的历史面貌。

抗战是 70 年代末崛起的觉醒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早在他

的大学时期，由于生性耿直，热爱解放后的新生活，因此以直言招祸，竟成为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的“扩大化”对象。身遭厄运，使他年轻的心灵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创伤。正是在他的痛苦的人生体验中，偶然得到了一本《野草》，他深深地为它所开拓和描述的深邃的精神世界困境而兴奋、震动以至战栗；而引起心灵上的激烈的骚动。他为了把自己的感受弄个明白，开始了系统地阅读鲁迅，研究鲁迅和学习鲁迅。当中经过十年“文革”浩劫的磨难，连他的“好地狱”也失去了，更谈不到做什么鲁迅研究了，但也正是这场空前历史浩劫的磨难，由于“事实的教训”，反而使他开始懂得了《野草》中的那些篇章的深刻内涵与意境，使他开始领悟到在那个黑暗的令人窒息的环境里，鲁迅的“不悲观，常抗战”的战斗精神和称赞在暴虐之下，敢于发出“活不下去了”的呐喊勇气。也因此，他虽僻处苏北一隅，而以学徒式的虔诚与审慎，在通读鲁迅全部著作的基础上，为了读懂鲁迅而研究鲁迅，积极投身于《野草》的研究，前后经过20年的春秋。他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研读心得，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研究《野草》的专著——《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于1981年出版，为在我国鲁迅研究领域里进行更深层次的开拓和发展，贡献了自己从探索中得来的心得。

在他对《野草》的第一部研究著作问世以后，为了进一步从《野草》中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进一步理解鲁迅，他从另一个新的角度——中外文学影响关系的角度，研究鲁迅与外来文化文学的关系。鲁迅对外来文化文学的接受，正像他那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抗生根据自己的认识与理解，集中精力于《野草》某些篇章与外来文学影响关系的专题研究，又经过了十余载寒窗之苦，他终于完成他的第二部《野草》研究新著《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

他的这部新著，除了三篇是关于《野草》与屠格涅夫散文诗关系的比较研究，两篇关于尼采及尼采与鲁迅创作关系的概观性

的研究，两篇尼采与《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以外，主要篇幅则是集中对《野草》的某些篇章与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微观性的比较研究。

我在这里除了作为引子概略性地对抗生这多年的鲁迅研究的历史背景和学习研究历程作介绍外，我还想说抗生现在这本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鲁迅创作的新著，其最大长处，即他的论文，没有陷入70年代末以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新的开放性的政治文化大环境下又重新崛起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对中外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用对号入座的方式，从中外两种文学具体作品之间的某些相似相近之处的表层现象着眼，进行简单的比附的新框架，而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鲁迅在多元性的吸取和借鉴外来文化，文学影响的过程中，是有所选择、有所吸取、有所扬弃、有所创造的，所有可称为影响了他的思想精神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外来作家和作品，都是他经过自己的选择和阅读、咀嚼以后，消化为自己的思想艺术血肉的，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因此，抗生的论文中，不仅指出了尼采思想和精神在鲁迅文艺创作中的某些影响表现的迹象，他更能从见于具体作品中的它们之间相通相似之处，发现鲁迅自己在思想精神境界上的独立品格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表现，他的带有明显的个人印记的思想艺术特色，他的独特的思想文化性格和文学风格。鲁迅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尼采学说中的某些论点，化为自己的思想血肉，而又走出了尼采。还可以看出，在抗生这部新著中，有的观点和认识来源于他在阅读时和思考中的直观或直觉性的感触，有的则是经过反复咀嚼有所省悟后的产物，它们都有较深层的意蕴，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深度，而又隐含着一种从生活而来的激情。它们都是作者在刻苦钻研尼采作品和鲁迅原作后，通过对鲁迅和尼采影响关系的具体研究和论证，对《野草》的研究中所得到的自己的新感受、新认识、新论点，它为我国的《野草》专题研究，以至鲁迅研究，走向更多角度、更多层次的开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学

术积累。它或会有其不足之处，但我相信，他的努力是诚实的、严谨的。也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有自己新的思想境界和美学价值的学术论文集，它的价值，不是市场观点可以估量出来的。

我与抗生相识和相交，说来也有十多个年头了，我们虽然是属于两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但大约是由于我们各自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追求、人生态度，以至文化性格，基本上都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开放性的文化环境气氛之下，因此我们能一见如故，声息相通。在近几年的经济大浪潮冲击下，在有些文人学士纷纷弃文下海从商，去做各自的黄金梦的时代气氛下，抗生却仍然能甘於清贫和寂寞，僻居于苏北一隅，执着於自己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继续在鲁迅研究的领域内，锲而不舍地埋头努力钻研，健步前进，并相继奉献出自己的新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像抗生这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学术品格本身，就是一种很有历史和现实价值的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现在他又将自己近几年先后发表在那些有一定学术影响的专业刊物上的从中外文学关系影响的角度研究鲁迅创作与外来文化、文学关系的论文和札记，集腋成裘，整理成专著出版，并约我为它写一篇序文，我也想藉这个机遇，向我国读书界介绍一下抗生走上鲁迅研究道路的历史时代背景和他具体研究的学术成果，所以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约请，并且也为了纪念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匆忙中写了这篇称为序的小文。

在目前文化出版事业日益陷入低谷的时势下，西北大学的《鲁迅研究年刊》主编阎愈新先生，毅然将抗生这本研究《野草》的新著推荐给他们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的《鲁迅研究书系》中，给它以问世的机遇，我作为这部书稿的一个读者，对于阎先生这种雪中送炭的高尚情怀，献身于鲁迅学研究和出版事业的崇高精神品格和执着的事业精神，顺致以我诚挚的问候和敬意！

1992年12月中旬在上海寓所

# 代自序：我的《野草》研究

## 回顾与自评——

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野草》研究竟成了我毕生的事业！

我和《野草》的不解之缘完全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

1961年将近岁尾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我觉得我的青春正被这寒冬所包围。一位友人默默地递给我一本薄而又薄的小书，它便是《野草》。

我从未读过这样奇异而美丽的书，力求对它作出一点解释；然而，我不能。在无言地将书揭到最末一页之后，对这位递书给我的友人，只能报以惭愧的微笑。

可是，《野草》中奇幻的景象，抑扬有致、绵密回环的音调节奏，“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凄怆而执拗的情绪，都向我显示了一种内涵丰富的悲剧的人生。我说不出它们的意蕴，然而有一些我能感觉得到。《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希望》、《颓败线的颤动》、《淡淡的血痕中》、《一觉》……，都有种莫名的力量使我战栗，而《墓碣文》中，这种悲剧性达到了可怕的境地。它们震撼了我的灵魂。

我要将我感受到的弄明白，寻个究竟。于是我开始阅读《鲁迅全集》，学习和研究鲁迅。

这就是我在《地狱边沿的小花》的“前言”中说的：“我是为了读懂它，才研究它的。”这种学徒的虔诚与审慎，使我在《野草》研究道路上摸索前进了30年，而始终只能作些微观的研究，不敢发什么伟言谠论。我的研究，错误或有之，浅薄也难免，然而不乏诚实，这是我的局限与长处。

从前面说的那个冬日，到 1981 年 5 月《地狱边沿的小花——鲁迅散文诗初探》出版前后几近 20 年。其间经历了十年浩劫和其后的几年恢复。我中断研究十年之后，受友人的鼓励重新握笔的时候，浩劫前写的一些文稿早已尸骨无存，连鲁迅著作也只有可怜的几本，而原先使用的《野草》单行本都无处寻觅了。1976 年秋，全国处于地震惶恐之中，我没有防震棚，白天躲进危屋，夜晚在廊檐下阅读一本本重新搜集来的“白皮书”、“红皮书”，以及鲁迅的年谱，关于鲁迅的种种回忆录，此外，还读了点马列，以为学习和研究之助。这样边工作，边搜集资料，边阅读，边写作，于 1978 年春夏之交写出了大部分手稿，在手边压了一年多，经我的老师赵国璋先生鼓励与推荐，于 1981 年 5 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出版后，一些师友问我为什么取这样一个费解的书名。然而我却很喜欢这个书名：首先，鲁迅本人就将《野草》称作“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在《失掉了的好地狱》中还用精细的笔触描绘了它。它不仅是对《野草》创作背景的极好的概括，也表明了我对于《野草》基本精神的理解——它表现了那个时期的鲁迅创作的“地狱气”，他的特殊的战斗，而不是如历来所说的什么表现其“自我意识”的“内心矛盾”或“心灵纪录”。我喜欢它，还因为它是个有文学意味的书名。此外，也因为出版社对书名的要求，——前此，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鲁迅研究丛书”已经出版了李何林先生的《〈野草〉注解》，为了避免书名重复，出版社建议我避开“野草”字样。我拟了几个书名，经斟酌后，选择了《地狱边沿的小花》，考虑到读者可能会有的疑惑，加了个“鲁迅散文诗初探”的副题。曰“初探”，是给自己留有余地。

应该“感谢”十年浩劫。没有这十年，我是不能理解《秋夜》的“天空”，《失掉了的好地狱》中的“地狱的边沿”，《影的告别》中的“明暗之间”，以及“影”何以要义无反顾地走向“黑暗”，“被黑暗吞没”的；没有这十年我也不能理解“绝望之为虚

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深刻的内涵；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不去“同情”那“求乞者”，而反给以“烦腻，疑心，憎恶”；不能理解为什么如人们说的那么“悲观”、“绝望”的鲁迅会期望着、寻找着“身外的青春”，当他从青年文稿中发现了青年灵魂的粗暴，竟那样的欣喜；不能理解一个“悲观”、“绝望”，内心那么“阴暗可怕”的鲁迅会怀有那样强烈的憎恨与大勇去揭露、诅咒那“造物”……是十年浩劫使我懂得了这一切，理解了在那个黑暗得可以令即使倔强的人也会愤怒得自杀的环境中，鲁迅的“不悲观，常抗战”的精神——理解了《野草》所表现出的鲁迅的“韧的战斗”。不错，鲁迅曾说过《野草》技术并不坏，但心情太颓唐了的话，但鲁迅同时又称赞过在暴政之下敢于发出“活不下去了”的叫喊的勇气。可见“颓唐”也有种种，并不能一律视作“绝望”的。据我的理解，鲁迅后来说《野草》写作时心情太颓唐了，那不过是表明随着时代的前进，要以更昂扬的意气迎接新的战斗吧了，并非意味着他对《野草》的否定，否则为什么在1929年他和冯雪峰的谈话中，对于《列宁青年》据《影的告别》指责他“虚无”表示了那样强烈的不满呢？——当然，这一切也并非经过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立刻全部顿悟了的，然而经历了那十年的“事实的教训”，我再读鲁迅，再谈《野草》便有了不同的感受。十年浩劫给我上了宝贵的人生的一课，这才有《地狱边沿的小花》的诞生。

上面是写《地狱边沿的小花》的一些背景情况。

《地狱边沿的小花》是一本对《野草》作微观研究的专著。它采取了以鲁迅证鲁迅的方法，融诠释、解析、鉴赏为一体，逐篇地对作品的背景、主题、形象，乃至某些难解的章句作了探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对《野草》的基本精神和创作方法的总体性认识。

当我开始研究时，手边只有学生时代购得而当时并未细读的卫俊秀先生的《〈野草〉探索》和冯雪峰先生的长篇论文《论〈野草〉》（据我的记忆，它最早刊于1953年的《文艺报》上，后

来新文艺出版社作为“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之一重印出版），再就是刘雪苇先生收在《鲁迅散论》中的论文《〈野草〉的〈题辞〉》及《论〈野草〉》。1976年秋冬之际重新开始研究《野草》时，听说北京有个鲁研室，由李何林先生领导，便将写成的5篇文稿呈寄先生指教。不数日，即接到李先生的回函，说可向本省师范院校学报投稿，并告知将以先生的论著《〈野草〉注解》见赠。至此我才知道有李先生的研究《野草》的大著。约一个多月之后，收到了李先生赐寄的《〈野草〉注解》和《鲁迅的生平及杂文》。受到先生的厚赐，我十分兴奋，但为了不受影响，李先生的书，我直到脱稿后才阅读。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的今人研究《野草》的著作，只有卫、冯、刘三位先生的大作。

卫先生的《〈野草〉探索》是《野草》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功不可没。刘先生的两篇论文分别写于1942年和1946年，是为纪念鲁迅逝世6周年和10周年而写的。三位先生的论著中，刘先生的论文发表最早，《鲁迅散论》出版于1951年，也在卫著和冯文发表之前。卫、冯二位可能都读过他的这两篇论文。刘文对冯文的影响在两个方面最为显著：（一）对《野草》作分类的研究；（二）对鲁迅内心矛盾的探究。然而刘先生与冯先生对《野草》的认识并不一致：刘文力图通过鲁迅“内心矛盾”的研究揭示出《野草》的积极的战斗的一面。刘著《论〈野草〉》第二部分以《墓碣文》为《这样的战士》的出发点，且说它“不仅没有什么‘虚无’，且与他全部作品同调，没有什么绝望与丧气。同一步调，同一色彩”。为证明包括《墓碣文》在内的《野草》与鲁迅“全部作品同调”，刘文的第三部分列举了《热风》、《坟》、《华盖集》、《集外集》中创作于《野草》同一时期（1926年下半年和1925年全年）的68篇杂文的篇目；冯文则着重于《野草》的“空虚”与“绝望”的证明。在卫、刘、冯三位的论著中，冯文最具分析性，写得也洋洋洒洒，文气沛然；加之本人的资历及在当时的地位与声望，因而影响也最大。这影响主要是：（一）对《野草》的分类

研究。分类研究始于刘先生的论文，而冯先生将其发展为对于《野草》的分等的评骘，此后的分类研究，多走的是冯文的路子。

(二) 对鲁迅“内心矛盾”的研究。由此引出了：(三) 他对于《野草》基本精神的论断。

三位先生中，我受惠于卫先生处最多。我的“以鲁迅证鲁迅”的方法，是受卫先生的启发；对整本《野草》作微观的研究则是卫先生开始的，我不过步其后尘；卫先生的书，还帮助我明白了一些篇什和形象的涵义。但我又觉得卫先生虽然注意到了《野草》的某些思想、形象、意境与鲁迅其它著作的联系，却未将《野草》放到鲁迅全部著作中去考察、认识，因而未能给我一个这一时期鲁迅的整体印象；对一些难解的问题，也未能作出满意的解释，不能完全解答我阅读《野草》的疑惑。冯雪峰先生的论文比较深刻，它启发了我对于《野草》内容的悲剧性的认识，然而他对《野草》基本精神的理解，以及与这种理解相应的分类(分等)，却使我感到茫然。雪峰先生对《野草》基本倾向的认识，早在 20 年代末与鲁迅的谈话中便以他特有的直率当面向鲁迅先生讲过，并且一直延续到 50 年代。例如在 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鲁迅》提到了作者在 1929 年和鲁迅的一次关于《影的告别》的谈话。那次谈话中，鲁迅先生对于《列宁青年》引《影的告别》为例证，指责他“悲观”和“虚无”，表示不满。冯先生说，当时他便“觉得他(鲁迅)不过重复一遍自己的老意见而已。因此，他的这种反击，也就显得不够有力”，对他“当时”的这种感觉，冯先生说，“现在想起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着重号是笔者所加)。《列宁青年》对《影的告别》的批评，关涉到对《野草》基本精神的理解，这种批评为冯先生认同，而不为鲁迅膺服，因此，对于冯先生对《野草》的批评，我便不能不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冯先生对于《野草》基本倾向的论断，由于没有对于《野草》的微观研究作基础，所以他的推论有时不免给人以粗疏之感，冯先生从《希望》的结句推论出“并未否定绝望”，是